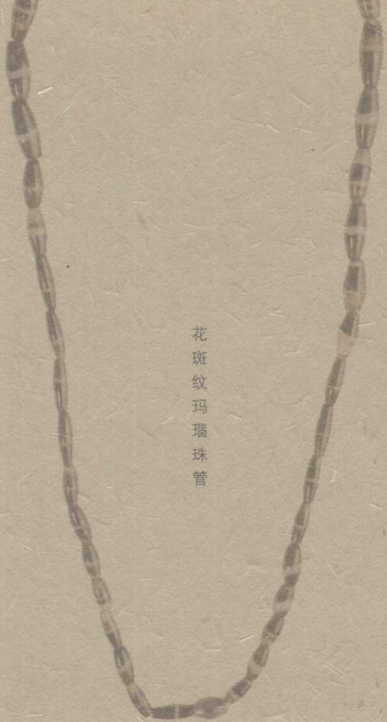


湖南出土珠饰研究

湖南省博物馆 编

喻燕姣 主编

Research on Beads
Unearthed from Hunan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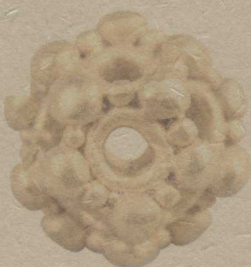


花斑纹瑪瑙珠管

Research on Beads
Unearthed from Hunan Province



Research on Beads
Unearthed from Hunan Province



镂空球形金珠

Research on Beads
Unearthed from Hunan Province



水晶珠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出土珠饰研究

湖南省博物馆 ○ 编
喻燕姣 ○ 主编

Research on Beads
Unearthed from Hunan Province



CB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出土珠饰研究 / 湖南省博物馆编；喻燕姣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 10
ISBN 978-7-5561-2070-3

I. ①湖… II. ①湖… ②喻… III. ①装饰制品—古器物—研究—湖南 IV. ①K876.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8813号

HUNAN CHUTU ZHUSHI YANJIU

湖南出土珠饰研究

编 者 湖南省博物馆
主 编 喻燕姣
责任编辑 龙妍洁妮
设计总监 魏 剑
装帧设计 谢俊平 谢慧敏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57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2070-3
定 价 39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本书研究写作得到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4WTB08)与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
重点实验室科学基金项目(GPMR201600)的资助

引言 / 001

新石器时期玉珠饰 / 016

1. 彭头山文化 / 016

2. 017

3. 屈家岭文化 / 024

4. 石家河文化 / 025

5. 032

6. 037

7. 039

8. 041

9. 049

10. 049

11. 041

《湖南出土珠饰研究》编委会

顾 问：陈远平

编 委：段晓明 李建毛 陈叙良 刘 春 张小河

郭伟民 王永彪 王立华 何旭红 刘 平

尚 巍 黄军认 席道合 马大明 张晓娅

李 莉 彭卓群

主 编：喻燕姣



目录

· CONTENTS

上编 图版



引言 / 001

一 新石器时期玉珠饰 / 016

1. 彭头山文化 / 016
2. 大溪文化 / 017
3. 屈家岭文化 / 024
4. 石家河文化 / 025

二 夏商西周时期玉珠饰 / 032

三 春秋战国时期珠饰 / 050

1. 玉石 / 050
2. 玻璃 / 089
3. 各种质地的串饰及其他 / 143



四 秦两汉时期珠饰 / 144

1. 玉石 / 144
2. 玻璃 / 186
3. 金银 / 205
4. 各种质地的串饰及其他 / 212



五 魏晋南北朝至清代珠饰 / 230

1. 玉石 / 230
2. 玻璃 / 245
3. 金银 / 247
4. 各种质地的串饰及其他 / 253

下编 论述

中国古代玉珠管饰的历史文化考察 段晓明 / 258

湖南出土珠管类饰物概述 喻燕姣 王卉 / 274

湖南地区出土的玉珠饰初探 王卉 / 284

湖南地区出土的战国玻璃珠饰初探 赖晓兰 / 295

湖南地区出土的金银珠饰初探 赖晓兰 / 303





湖南出土珠饰材质及显微特征分析 罗泽敏 喻燕姣等 / 311

湖南澧县孙家岗 M14 石家河文化玉器研究三则 喻燕姣 / 320

湖南战国墓出土的两组玉器研究 喻燕姣 / 340

湖南出土的花斑纹玛瑙珠
——兼论南方丝绸之路中玉文化的传播 喻燕姣 / 357

汉代长沙国王侯墓出土玉器述论 喻燕姣 / 374

湖南出土的宋元玉佩饰研究 段晓明 喻燕姣 / 394



附表

附表一 湖南出土主要玉石珠饰统计表 / 414

附表二 湖南出土主要玻璃珠饰统计表 / 443

附表三 湖南出土主要金银珠饰统计表 / 461

附表四 湖南出土主要不同质地串饰及其他珠饰统计表 / 467



后记 / 473

引言

一、概论

1. 珠饰概念的界定及研究状况

本书所研究的珠饰，是狭义上的人体所佩戴的“珠饰”，主要指经过人为加工后，其上有孔可穿绳系戴的不同形状、不同材质的佩饰。穿绳系戴是其明显的外在特征，有装饰、表明身份等级、辟邪、宗教、财富等多重文化内涵。种类至少包括两大类：一为串珠。有穿孔，以便穿系组成串饰，为最常见种类。二是坠饰，既可作为串饰下方的重点装饰，也可是单独穿绳佩戴的饰品。因此，那些有穿孔、无需用绳穿系的首饰，如戒指、镯子、带脚的耳饰、戴于头上的发饰、冠饰，以及缝于衣服、腰带上的佩饰等均不属于本书的研究范畴。部分用途尚存争议的、或有多种用途的佩饰，如澧县孙家岗遗址 M14 出土的龙形玉佩、凤形玉佩等，暂且纳入本书研究中。

从目前考古发现情况看，珠饰材质非常广泛，有机质材料包括珊瑚、琥珀、贝壳、木头、植物种子和动物骨骼、牙；矿物材料包括石头、广义上的玉石和宝石；金属材料，如金、银、铜等；人工合成材料，如陶瓷、费昂斯、玻璃等。

珠饰作为人类重要佩饰，自远古之时起就深受人们喜爱。国外对珠饰的研究^①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经过数代研究者的努力探索，珠饰已被视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器物，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各种研究手段日渐被公诸于世，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珠饰在古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当然，由于珠饰数量太过庞大和传播范围之广阔，加上新的研究方法、检测技术手段的日益更新，很多学者认

^①参见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第一章第四节《国内外珠饰发现与研究回顾》，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4、22页。



为需要继续加强珠饰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洛阳金村八座被盗战国墓出土了数量相当多的玻璃珠,中国珠饰的研究肇始于此。^①此时研究的重点是玻璃珠制造工艺的起源问题,其他的诸如文化内涵、产地、纹饰等问题探讨并不充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全国大范围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古代珠饰,种类非常丰富,但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珠饰研究并没有受到重视。在中国出土珠饰中,受到较多关注的是蜻蜓眼式玻璃珠。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尤其是楚地出土了大量的蜻蜓眼玻璃珠管,逐渐引起了学界重视,成果较多。此外对多面金珠、夹金箔层的玻璃珠、钾玻璃珠等也有一些讨论。探讨最多的是在研究人体装饰品时,牵涉了珠饰,而且主要是广义上的玉珠饰。整体来看,玻璃珠饰、玉珠饰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其他质地珠饰的成果相对较少。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珠饰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不俗成果。朱晓丽的《中国古代珠子》(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赵德云的《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可为典型代表。

2. 湖南出土珠饰研究的意义

湖南出土珠饰数量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两件。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各市、州、县级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均有一定数量的收藏。目前湖南出土珠饰研究著作还未见,期刊也只有部分文章触及这方面的问题,系统性研究的文章尚是空白。所以本书旨在以湖南省出土珠饰为研究范围,在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对不同材质的出土珠饰分时期进行深入系统剖析,以提高湖南出土珠饰的研究水平,丰富湖南出土文物的研究内容,展示湖南丰富精彩的珠饰文化,并希望借助此书,以点带面,推动中国古代珠饰文化的研究。

3.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创新之处及存在的问题

(1)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本书以湖南省内各文博单位所藏出土珠饰为研究对象,按照历史发展脉络,从

^① 参见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第一章第四节《国内外珠饰发现与研究回顾》,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8页。

各种材质珠饰的考古发现、种类与功能、造型与装饰、材质及其源流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探讨各种材质珠饰的源流与发展、造型纹饰的演变、制作工艺的进步、文化内涵的解读，并利用肉眼观察和大型仪器无损测试等方式，探讨各种珠饰材质的质地和特征，进而分析材料来源。

本书对湖南出土珠饰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考古学为基础，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互相补证，以科学检测和工艺研究作为补充。同时，由于珠饰材质广泛，这就关联到自然科学中众多领域，且由于珠饰又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涉及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包括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美学、工艺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因此，为全面深入科学研究湖南出土珠饰，我们综合了众多学科，在掌握大量真实可靠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一切有益的研究方法，进行多维角度的综合研究，力求复原湖南历代珠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第一，根据器物在墓葬中的位置进行研究。研究出土珠饰，考察其在墓葬或遗址中的出土位置极为重要，是我们认识古代珠饰用途的重要依据。单纯依赖文献难免会产生偏颇。如玉璧，其用途有很多，既可作礼器、丧葬玉、财富，又可作佩饰等。主要看其在墓中的出土位置。湖南战国、两汉墓出土了大量玉璧，有的尺寸非常大，多为双身合首龙纹璧、凤纹璧、谷纹璧、蒲纹璧、云纹璧等，它们大都位于墓主尸体周围、墓主头端棺板盖上或棺椁之间这些位置。这是楚汉葬玉在墓葬中的基本排列方式，其作用是导引墓主灵魂顺利升天，显然，这些玉璧属于丧葬礼玉。只有那些尺寸较小，出土于腰部、颈部以下或明显可看出与其他玉佩进行组合佩戴的玉璧才是佩璧，又称系璧。其他的珠管形饰也是如此，出土于颈部的应为项饰，出土于手部的应为腕饰。根据其在墓中的位置，来辨别珠饰的功用是最为可靠的。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有的珠饰，其在墓中是作为随葬明器使用的，材质不讲究，制作工艺较为粗糙，不属于墓主生前佩戴实物，那么，本书亦将之摒弃于外。还有的珠饰，尽管其外形均符合珠饰特征，但它们是代替其他礼器使用的，本书也不予收录。如澧县孙家岗石家河文化M14出土的小玉璧、小玉管，它们是替代玉璧、玉琮作为礼器使用的。楚汉墓葬中往往殓葬玉器、组玉佩混合在一起，这也需要仔细甄别。

第二，利用自然科学的检测法研究珠饰。用科学检测法来鉴定珠饰材质，对研究珠饰来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战国玻璃珠为例：湖南出土了大量战国玻璃珠，



既有素面的，也有蜻蜓眼的，尤其是蜻蜓眼这种纹饰的玻璃珠最初是由国外输入的，后来被中国本土先民接受，并制造了大量纹饰、造型一致的玻璃珠，肉眼很难加以区别，唯一的方法是通过仪器检测其化学成分。国外的素面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为钠钙玻璃，我国国产的玻璃珠为铅钡玻璃。其他如琥珀（波罗的海沿岸、缅甸等地）、蚀花玛瑙（印度、西亚等地）、海蓝宝石、石榴子石等半宝石也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检测方法比较其化学成分，分析其产地。此外，对一些材质不明或存疑义的珠饰，也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检测法分析其材质成分，并进而研究其来源。

第三，充分利用国内外出土珠饰材料作比较研究。从已有资料可知，国外对珠饰的喜爱程度远甚于中国，且出土珠饰数量非常庞大。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很多珠饰是通过海外贸易传输进来的，像多面金珠、多棱柱体水晶和玛瑙珠管、蚀花玛瑙珠、钠钙成分的玻璃珠、蜻蜓眼式钠钙玻璃珠、费昂斯珠、琥珀辟邪形珠等等，厘清这些珠饰的来龙去脉，对我们研究湖南出土珠饰来源和产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从功用角度出发加强珠饰文化内涵的研究。珠饰除具备最起码的装饰作用外，它在不同历史时期还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以玉珠饰为例，它最初出现时很可能只是单纯作为装饰品使用，起着美化自身的功能。到了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随着私有制出现，阶级出现了分化，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聚落首领和神职人员身份的象征，同时又是举行祭祀仪式时沟通神人之间的神物。以“玉”作为沟通“神”和“人”之间的媒介，传达上天的信息和意志，“以玉事神”是这一时期的特征，玉属于“神圣化了的精神产品”，并与等级身份有关；商代的玉珠饰还可以作为奉献给神灵的祭品；西周玉珠饰多为其时盛行的组玉佩中的构件，成为权力和社会等级的标志，具有人文色彩；春秋战国时期，玉被儒家学者赋予了道德内涵，玉珠饰有了“人性”的光芒。佩带珠玉成为君子有德的象征；秦汉珠玉较先秦不同的是文化内涵的转变：先秦人们佩戴玉珠饰主要体现权力和社会等级，而汉代个人装饰品增添了祥符的寓意和与此相关的题材造型，更多的带有信仰、装饰和奢侈的内涵，同时起着“护身符”的作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玉珠饰沿袭汉代，种类没有重大变化，但数量大幅度减少。汉代盛行的祥符题材辟邪小兽珠在此时继续流行。珠串和玉辟邪形珠不仅是身份的标志，与财富和社会地位相关，是一种奢侈行为的表露，而且被赋予了信仰的意义，更多的是与人生祥瑞的意义有关联，如龟即寓意“寿”等；隋唐以后，玉珠饰逐渐世俗化，

几乎人人皆可佩戴，它的神秘性不见了。宋代水晶珠和水晶佩饰十分流行，这与水晶珠本身作为佛教供奉的宗教用品有关。而且特殊的珠玉组合形式依旧是特殊阶层的标志，尤其是皇家舆服制度中保留着其对等级区分的标志作用，像明代的组玉佩、清代的朝珠等，已具有行政意义。

（2）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内容分成上下两编及附录。上编是珠饰图版。以历史时间为脉络，按玉石、玻璃、金银及其他质地的串饰分类，选择代表性珠饰，从其基本特征、制作工艺、文化内涵等方面予以阐述，再配以高清晰、多角度图片，尽量复原各个历史时期珠饰原貌。下编是论述。从各个角度对湖南出土珠饰进行全方位总结，既有宏观综述，也有微观讨论。前者既有整体思考中国珠饰历史地位的，如《中国古代玉珠管饰的历史文化考察》；也有对湖南本土出土珠饰进行综合分析的，如《湖南出土珠管类饰物概述》《湖南地区出土的玉珠饰初探》《湖南地区出土的战国玻璃珠饰初探》《湖南地区出土的金银珠饰初探》《湖南出土珠饰材质及显微特征分析》等。后者是从微观角度对某一时期的某一类或某一种珠饰予以深入剖析，如《湖南澧县孙家岗 M14 石家河文化玉器研究三则》《湖南战国墓出土的两组玉器研究》《湖南出土的花斑纹玛瑙珠——兼论南方丝绸之路中玉文化的传播》《汉代长沙国王侯墓出土玉器述论》《湖南出土的宋元玉佩饰研究》等，分别从不同方面对湖南出土珠饰特点进行论述，关乎珠饰器物的甄别，包括葬玉与实用佩饰的分辨，明器与实用器的分辨等，如澧县孙家岗 M14 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小玉管、小玉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佩饰，而是作为明器礼器使用。同时也包括了对某一类或某一种珠饰的特点、制作方法、来源、用途进行了探讨。如花斑纹玛瑙珠管、组玉佩等。

此外，为了对湖南出土珠饰有一个全面掌握，我们尽可能地收集所有珠饰材料，制作成表格，以方便学者研究和查阅。总之，我们尽力还原湖南各个历史时期珠饰的使用情况、制作工艺、来源产地、文化内涵，全面系统地呈现湖南历代珠饰特点。

（3）创新之处

收集材料较全面，基本网罗了湖南出土的主要珠饰，其中很大一批文博机构收藏资料属于第一次公布数据和图片；内容较系统，第一次对湖南出土珠饰进行全面分类整理；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法



相结合、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所收珠饰材质较多，研究对象具有较广泛性。

（4）存在的问题

一是湖南出土珠饰的时代，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朝，时间跨度大，且湖南出土珠饰覆盖面广，器物收藏单位较分散，很难集中起来做分类比较。虽然本书研究写作得到了湖南省文物局及湖南大多数文博单位的支持，但仍有少数文博单位的资料未能予以收录，且要穷尽湖南出土珠饰有操作上的困难，因此严重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二是受文物保护的限制，只能对少数代表性出土珠饰进行无损大型仪器测试，这也使得部分珠饰材质依旧停留于“不明材质”身份上，对其来源和产地难以做出判断。三是有些墓葬早年被盗，器物位置遭到移动，即使没被盗的墓葬，器物位置也可能由于重力、积水、塌方等因素而移动，珠饰在墓葬中的位置已不清楚，很难就其具体用途做出正确分析。四是目前国内珠饰研究还处于初级水平，可供参考的详尽记录描述和可利用的图片资料并不多，相关科技测试也未能跟上，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与国内发现的比较研究相对滞后。基于以上原因，湖南出土珠饰研究要取得更大突破尚需假以时日。

二、湖南出土珠饰概况

1. 玉珠饰

从目前发表资料的情况看，湖南出土玉珠饰主要为魏晋之前的，其中以战国、汉代最多，商代、新石器时代次之，其他朝代很少甚至没有；从地区来说，以湘江流域出土最多，尤其是长沙地区，占了绝大部分；从器物品种来说，主要有璜、环、玦、珠管、小系璧、坠、耳珰、串饰、鞞形佩、觿形佩、司南佩、云形佩、几何形佩、动物形佩、组玉佩等。从材质来看，有软玉、蛇纹石玉、玛瑙、水晶、绿松石、琥珀、翡翠、海蓝宝石、石榴子石、煤精等广义上的玉材和半宝石；在制作工艺上，采用了传统的琢玉手法，包括开玉成型、钻孔、阴刻、浮雕、圆雕、镂空、镶嵌、掏膛、打磨与抛光、俏色、改制等工艺。器物造型和纹饰风格均继承了中国古代玉雕的基本式样和花纹特点。

湖南出土玉珠饰大体可分为新石器、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清代几个阶段：

湖南新石器时代玉珠饰主要分布在湘、资、沅、澧四水或洞庭湖区域内，以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为多，种类有璜、玦、环、坠、珠管、动物形佩等，大多无纹饰。晚期石家河文化出现了龙凤形佩、玉人首等神秘色彩玉饰，玉珠饰由开始的纯装饰品向带神圣化色彩转变，这也标志着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时代的肇始，象征着持有者特殊的权力和地位。

夏代玉珠饰在湖南尚未发现。商代湖南玉珠饰品种虽然不够丰富，以玦、环、珠管等为主，大多无纹饰，但数量如以单个来计算的话，也有上千件以上，而且这一时期的玉器材质大多以软玉为主，用料很讲究，且大多出土于青铜器皿内，被埋在山腰、山顶、山脚或河岸边，其用途是作为祭品祭祀山川河流，这一点已毫无疑问。这与殷人以玉作为礼器信奉鬼神、祭祀鬼神不无关系。

由于西周遗址和墓葬发掘过少，湖南的西周玉珠饰出土不多，已发现的珠管、玦等玉珠饰均保留有商代玉器的风格，均零星出土，毋庸置疑是作为佩饰使用。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到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初步确立，社会经历了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过程，但分裂的政治局面并没有阻碍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反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学术上百家争鸣，艺术上百花齐放，玉器文化得到了蓬勃发展。此时期的玉珠饰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专享的奢侈品，而且表现出一定的普及倾向，上起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无不以玉为贵，视玉为宝。玉珠饰此时也与礼制完美结合起来，加之儒家倡导玉有德，将玉人格化，“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成为时代风尚，佩饰玉成为最流行的装饰品。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玉器由神秘化向人格化的转变。湖南出土的玉珠饰种类有珠管、环、璜、玦、系璧、鞞形佩、觿形佩、几何形玉佩、动物形玉佩、组玉佩等，造型优美。在制作方法上也有长足进步，有纹饰的玉器多于无纹饰的玉器，这是不同于湖南商代玉珠饰的一个重要特点。

秦代历史过短，考古所见的秦代玉器寥寥无几，湖南亦不例外。两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文化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汉代玉器是在继承战国时代玉器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艺术风格上则更多地吸收了楚文化



玉器清逸脱俗、自由浪漫的特色，融合成汉代玉器所特有的雄浑豪放、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把中国古代玉器推到一个新的高峰。此时期湖南出土的玉珠饰，以璜、环、玦、耳珰（喇叭形管）、鞞形佩、司南佩、辟邪形珠、珠管、组玉佩为主，海外输入的水晶、玛瑙珠数量较多，玉质好，雕琢精，构图变幻莫测，设计新颖而不囿常规，纹饰华丽却不落俗套，整体形象充满动态和灵气。这表明玉珠饰已开始摆脱传统礼制观念的束缚，走向表现个性化、增添祥符的寓意、追求信仰以及艺术价值的更高阶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玉器工艺进入低谷。从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玉器不仅数量少、品类乏、玉材差，而且从造型、制作技术等方面都深受汉代玉器的影响。这与当时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是分不开的。湖南出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玉珠饰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特点，除了刘弘墓出土了较丰富的玉佩饰外，其余墓葬出土玉珠饰极少，多为玛瑙、水晶制作的珠管。

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的玉器制作在曲折中前进，并在清代中期达到了古玉制作的顶峰，表现为传世玉器的数量之多和质量之好，是任何一个朝代都难以企及的。从全国范围的考古情况看，此阶段出土玉器较少，但大多比较精巧。湖南这一阶段的出土玉珠饰非常少，以珠管为多，另有环、牌形佩、镂空玉佩等，难以反映出玉珠饰发展的历史脉络，究其原因，除了丧葬观念的改变、盗墓成风等原因外，可能与湖南地区得玉不易不无关系。

2. 玻璃珠饰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湖南地区出土的玻璃珠饰从战国至清代的均有，以战国至两汉时期的为最多，其他历史时期的较少见。

战国时期的玻璃珠饰品种有珠管、环等，其中以珠管的数量最多。珠管既有素面的，也有蜻蜓眼的，其中蜻蜓眼玻璃珠管占了绝大多数。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管已有 240 多件。大多是组玉佩中的部件，少量作为手串或项链使用。

素面玻璃珠管颜色多样，有蓝色、白色、浅蓝色、紫蓝色、深蓝色、天蓝、孔雀蓝、翠绿色、浅绿色、湛蓝等，这说明湖南地区古代的玻璃工艺大师们不仅能将玻璃制作成玉的形状与质感，而且对玻璃着色剂的掌握也非常熟练了。

蜻蜓眼玻璃珠管数量较大，形状有球形、扁球形、算珠形、圆柱形、短圆柱形等，胎体有透明、半透明和不透明三种。尺寸较小，直径一般在 2 厘米左右，大多为 1 ~ 1.5

厘米。蜻蜓眼的数量有3、4、6、8、9、12、15、18、20、24、30眼等。可分为层状眼珠、圆斑状眼珠、套圈状眼珠、几何线间隔眼珠、嵌环眼珠、镶嵌玻璃料卷眼珠、组合型眼珠等七种主要类型。由于蜻蜓眼式玻璃珠都是手工制造的，随意性较大，很难找到两件一模一样的。

素面玻璃珠和蜻蜓眼玻璃珠，经专家对其成分进行测试，发现既有钠钙玻璃（又称西方玻璃），又有铅钡玻璃（国产玻璃，也称中国式玻璃）和钾钙玻璃（国内国外的均有）。无论是外来品还是本土自制品，这类玻璃珠均出土于等级较高的墓葬中，这说明在当时，玻璃珠是非常珍贵的，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湖南出土的战国玻璃珠，类型丰富，数量多，居全国之首，且大部分为国产玻璃，因此不排除当时湖南是玻璃器生产基地的可能。蜻蜓眼玻璃珠是当时的楚人仿制西亚钠钙成分的蜻蜓眼玻璃珠制作而成的。

玻璃环数量不多，分为素面环和谷纹环两类。为佩饰，系采用模压工艺制作而成，先熔融后成型，这应该是从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发展而来的。环的颜色有乳白色、绿色等，大多模压谷粒纹，均为模仿玉环制作，是属于仿玉风格的玻璃佩饰。

这时期的珠饰还有一种学界称为“费昂斯”或“釉砂”的原始玻璃珠管饰，其主要特征是外表为蓝色或浅绿色，主要原料为石英，不是玻璃态，而是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的烧结体。它们是将石英砂等粉末拌入少量的助溶剂和黏合剂塑成珠管形，加热到900度烧制而成。由于温度较低，故未达到玻璃的效果（玻璃熔炼温度要在1200度以上）。这类珠管大多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颈、腕部并与玉石、玛瑙等质地的珠管在一起，均是作为佩饰使用的。

湖南两汉时期的玻璃珠饰数量较大，有上万件之多。主要品种有珠管、耳珥等，珠管均为素面，颜色多样，有绿色、深蓝色、天蓝色、紫色、草绿色、黄色、黑色、红色、灰色、褐色、白色等；珠多作椭圆球形、算珠形、球形、圆珠形、扁珠形、短圆柱形、短梭形、瓜棱球形、葫芦形等，管有六棱面体梭形、长圆柱状等；耳珥数量较多，作喇叭形，一端粗，一端细，两端平直，中部束腰，类似于汉代玛瑙喇叭形耳珥，应为仿玉制品。

湖南两汉玻璃珠饰中有大量深蓝色玻璃珠，经检测为钾玻璃。这些玻璃珠曾广